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北宋」张载

为往圣继绝学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学生优秀学术论文集



NLIC 2970623401



岳麓書社

為往聖絕學

主編 黃朴民 副主編 陳壁生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學生優秀學術論文集



NLIC 2970623401



岳叢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往圣继绝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学生优秀学术
论文集/黄朴民主编. —长沙:岳麓书社,2010

ISBN 978 - 7 - 80761 - 460 - 9

I. 为... II. 黄... III. 国学—文集

IV. ①Z126.2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7162 号

为往圣继绝学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学生优秀学术论文集

主 编:黄朴民

责任编辑:彭卫才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刘 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 yueluhistory. com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 × 1240 1/32

印张:11.875

字数:310 千字

印数:1—1,500

ISBN 978 - 7 - 80761 - 460 - 9/I · 928

定价:25.00 元

承印:湖南贝特尔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序

纪宝成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统称，“国学”在当代的兴起，与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密切相关。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而言，如果缺乏伟大的民族精神，便像一座恢宏的圣殿缺少了庄严的神像，势必显得空洞而孱弱。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提高，令世人刮目相看，必须加强文化建设，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也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国学的意义，即在于重新从古圣先贤的经典中，寻找新时期民族思想文化、政治社会建设的必要资源。因为，做为泱泱大国，中国对世界不但负有经济上、政治上的责任，而且更负有文化上的责任。

但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国学的中断，却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这种中断，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与现行的学科分割局面密切相关。在晚清民国时期，“国学”兴起，涌现出一批学贯中西，既对中国传统有深切的研究与尊重，又对西方文化有深刻的认识与考察的国学大师，他们构成了学术史上灿烂的群星。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国学大师们的学问并没有得到顺利的继承与弘扬。这与引入西方现代学术分科体系，学术研究日益褊狭有着重大的关系。近代以来，存在着多元的国学观，例如章太炎、马一浮、胡适之的国学观便大不相同；同时，也存在着多元化的国学教育机构，例如清华国学研究院、无锡国专、章氏国学讲习会、马一浮复性书院的国学教育也迥然有别。但是，胡适之所提出的国学观占据了主导地位，“整理国

故，再造文明”的口号，直接导向以西方学术分科为主导的学术格局，从而导致整体性的国学研究逐渐弱化乃至消失，分科式的学科研究遂成一统。时至今日，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学科分化日益细密的利弊得失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主张也要以综合性、整体性、当代性、世界性的眼光看待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这是人文学科建设的时代潮流，也是国学事业重振的历史契机。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即是接续近现代国学大师们所设想的，以综合性、整体性、当代性、世界性眼光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挖掘民族精神的传统，淡化文、史、哲的分科格局，而把“国学”本身视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学科进行研究。所以，我们设立了经学与子学、国史、国文、小学等教研室，重在直接面对原典，对原典进行现代解读。这种教育方式，旨在培养能够打破现代学术分科格局，直接从传统文化的源头整体性地把握传统精神的人才，与文、史、哲分科学习和研究相辅相成，互补共生，共同促进我国人文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我们深知，接续百年大业，复兴吾族古学，决非朝夕可就，而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因此，国学院成立五年来，一直非常注重对学生学术能力的培养。在本科学习阶段教育上，不但要求本科生撰写毕业论文，而且要求每位学生都必须在本科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一篇原典读书笔记，一篇游学报告。更重要的是，学院每年举行一次“学术活动月”，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学生提交学术论文，开展学术切磋。本论文集，即是国学院同学沉淀思想探索，从事学术研究的结晶，入选的论文，既有学术活动月中获奖的优秀论文，也有发表在国内重要核心期刊上的试笔之作。论文的选择，更注重经典文本的思想诠释，经典问题的现代解读，蒙藏文献的重新整理等。面对学术分科日益细化，宏大问题日益不受关注的学术局面，一种对传统学术的

综合性认识，可以为这个时代的学术注入新的活力。

在这个复杂而多变的时代，从西方发轫的现代性业已向历史展现了其丰富的创造空间，但同时也暴露了其各种各样的弊端。我认为，每一个伟大的时代，都会从直接探寻古典文明中找到推动时代进步的思想资源；作为一个业已具备五千年文明积累的民族，中华思想的新开展，政制的新建构，社会的新发展，都需要从古典文明中汲取伟大的智慧。这个族群的古典文明，一定能够帮助推动这个族群走向新生。

接续国学传统的关键，在于培养一大批思想高远、兴趣广泛、术有专攻的国学研究人才。青年是国学研究未来的希望。接续民国时期国学大师开创的各种学术研究范式，把国学研究发扬光大，不但需要国学院教师们有意识的努力，而且更需要同学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部论文集的面世，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方面的一个象征。我相信，通过不懈地努力，假以时日，我们的国学研究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

目 录

经

- 章句与经典 刘 伟 (003)
- 以《论语》通五经
- 宋翔凤《论语》学主旨探论 张向荣 (019)
- 顾命礼说 顾大朋 (031)
- 外王与内圣
- 由“学而时习之”之“学”看汉、宋儒学之分野
..... 张 芸 (037)
- 《论语·先进》第二章考论 高如辰 (061)
- 《论语》中“善人”的汉宋之别
- 以刘宝楠与朱熹注本为例 皮迷迷 (072)

史

- 汉简所见边地戍所的肉食消费 赵宪亮 (095)
- 宣帝朝的文法吏与经术士 李昶磊 (119)
- 隋唐丁中制探源
- 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户籍文书切入 徐 畅 (129)
-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汉译藏传密教仪轨《吉祥喜金刚
集轮甘露泉》初探 安海燕 (153)

关于外藩蒙古喀喇沁旗的一份顺治朝满文题本

..... 宋 瞳 (182)

近代中国认同的起源

——以康熙《皇舆全览图》为中心 魏 寅 (199)

子

“自私自利”与“纯乎天理”

——黄宗羲人性论的政治学分析 顾家宁 (225)

《吕氏春秋》与稷下学宫 安一硕 (243)

“清华简”《保训》篇研究简评

——对《保训》篇“中”的一点诠释 魏忠强 (267)

关于《孙子兵法》中“速胜”思想的几点看法

..... 杨源泉 (276)

集

宋代《江西诗派》的编刻 陈 斐 (297)

米芾文集流传考辨 周兴禄 (306)

论民国时期江浙地区的诗歌吟诵与时调之关系

..... 刘 芳 (317)

论顾恺之的“痴绝” 黎 臻 (343)

徐渭画论述略 尹帆森 (360)

经

章句与经典

刘 伟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

一、论章句及经学的败坏

惠栋《九经古义》对何休注《公羊传》做如下评断：

《公羊》有严、颜二家。蔡邕《石经》所定者，《严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颜氏春秋》也。何以知之？以《石经》知之。《石经》载《公羊》云，桓公二年《颜氏》有“所见异辞，所闻异辞”云云，是《严氏春秋》已见于隐元年，于此不复发传也，今何本有之。^①

惠定宇所据以证者颇多，兹不赘引。唐晏《两汉三国学案》据此将何休归为颜氏《公羊》学谱系之中。然何休《解诂序》曾以为《公羊》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以致“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徐彦疏解此语有云：

任意者，《春秋》有三世异辞之言，颜安乐以为从二十一年之后，孔子生讫，即为所见之世，是任意。^②

三世中之所见世，说者一般以为系昭、定、哀三世。颜安乐以

① 参见四库本。

② 《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为自孔子生年为断，以致有“任意”之讥。不止于此，何休又批评颜安乐“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云云。由此可见，唐晏将何邵公归为《公羊》颜氏一派显然不妥。然而由惠氏之说，何休作《解诂》乃以颜氏《公羊传》为底本似是确定不疑之实，严、颜二家之说虽同出自眭孟却各自名家，按钱穆的说法，“家法即章句”^①，则颜、严二家《公羊春秋》乃是两种不同的“章句”。

然而，何为章句？

考之《汉书·艺文志》，《易》之《章句》有施、孟、梁丘，《书》之《章句》有欧阳和大、小夏侯，《春秋》之《章句》则有《公羊》《穀梁》。然据钱宾四先生考证，不特上述所列，《鲁诗》《齐诗》《韩诗》《左传》等皆有章句^②，可见章句之兴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关涉整个经典体系的普遍现象。若要对这个普遍现象的性质有所了解，就必须弄清楚章句何时兴起，章句解读经典的方式，以及章句兴起前后对经典存在方式的影响。

据东汉徐防说，“发明章句，始自子夏”，直以章句之学上承孔圣之门，则章句之学渊源远矣。吕思勉先生则以为章句初即今所谓符号，其后经义难明，符号之外，又有解说，即今所谓师法^③，由此，则章句之源亦必将追至先秦。钱穆先生则以为章句之兴在西汉昭、宣以下，其时《五经》分析，各自名家，遂有“家法即章句”之说。三说之不同，或在于对“章句”这一概念理解不同，然揆诸《汉书》所载，则当以钱宾四先生之说为是。据《汉书》所载，施、孟、梁丘三人之学均出自田王孙，其中梁丘贺于宣帝神爵三年出任少府，荐施讎，其

①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23页。

②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25～230页。

③ 吕思勉：《文字学四种》，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0页。

后甘露三年石渠阁会议之后，施、孟、梁丘三家立于学官，则三家章句之作必不早于宣帝时期。以《尚书》之章句言，《汉志》有欧阳及大、小夏侯三家。据《夏侯胜传》载：

（夏侯建）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①

《尚书》之传承，大体而言，欧阳生及张生均出自伏生，张生传夏侯都尉，其后夏侯始昌、夏侯胜、夏侯建累次相传；倪宽受自欧阳生及孔安国，传于欧阳氏及蔺卿，蔺卿及欧阳氏曾传夏侯胜，欧阳氏则又累世相传，至有欧阳高及欧阳地馀，欧阳高又曾受夏侯建。由上文大夏侯非小夏侯云“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则《汉志》所载《大夏侯章句》必不出自夏侯胜，乃是出自大夏侯后学，《欧阳章句》亦如此。大夏侯乃昭、宣时期人，夏侯建师事夏侯胜，则小夏侯之作《章句》必不早于宣帝时期。至于《大夏侯章句》《欧阳章句》，乃为各自传人所作，又在《小夏侯章句》之后，诚如钱穆先生之说^②。至于《汉志》所载《公羊章句》《穀梁章句》文献阙略，无可稽考。然以意推之，《穀梁》之立于学官在石渠会议后，则其《章句》之后必在其后；至于《公羊章句》，史籍所载止云“《公羊春秋》有严、颜之学”，未闻严、颜曾作《章句》，则《公羊章句》之成又或在二人之后。要之，章句之作未必出自某家之先师，往往多为后学依师法敷衍成文，而章句之兴大体在宣帝时期。

① 《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3159页。

②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25页。

那么，章句如何解读经典？

皮锡瑞《经学历史》曾质疑各家博士之立，其云：

汉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独守遗经，不参异说，法至善也。《书》传于伏生，伏生传欧阳，立欧阳已足矣。二夏侯出自张生，而同原伏生；使其学同，不必别立；其学不同，是背师说，尤不应别立也。^①

皮氏所说虽不无道理，然未详考师法传承及章句之特征。所谓“《书》唯有欧阳”之欧阳非指师事伏生之欧阳生，乃是倪宽所传欧阳生之子或欧阳高。何以知之？据《汉书·儒林列传》载：

宽有俊才，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欧阳、大小夏侯氏学皆出于宽。^②

吕思勉以为，此所谓“朴学”之“朴”即《老子》“朴散而为器”之“朴”，所谓木不斫不成器也^③。因此，武帝所言“以《尚书》为朴学”乃是指质朴而无义理之学，必待敷衍方为可观，故而有欧阳、大小夏侯氏学皆出于宽的说法。上文曾提及，夏侯胜曾师蒯卿，蒯卿师倪宽，而夏侯建又曾师欧阳高，故可以说大小夏侯氏之说出于倪宽。至于欧阳氏之学出自倪宽，则此处欧阳必非倪宽之师欧阳生，乃是指欧阳生之子欧阳高等。倪宽之异于其师欧阳生者，其一倪宽有俊才、善属文，或依师法而敷衍师说；其二，倪宽曾师事孔安国，故其学非纯为欧阳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63年，第77页。

② 《汉书》，第3603页。

③ 《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86页。

生之学。孔安国曾见古文尚书，其学又非伏生所能囊括。

依师法敷衍师说，又或旁及他说以益己说，乃是师法传承应有之义。上文曾引大夏侯批评小夏侯“章句小儒，破碎大道”，说者多以小夏侯不守一师之法为说。然大夏侯亦非专守一师之说，据其本传，夏侯胜初从夏侯始昌学，其后又事蔣卿及欧阳氏，《传》云其“所问非一师”。故而可知，大夏侯之非小夏侯者，非以其“左右采获”，乃是因夏侯建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矛盾之处，排比章句，以资应敌。故而，小夏侯非议大夏侯之说疏略难以应敌。王式曾事徐公及许生，传《鲁诗》。据《汉书》载：

山阳张长安幼君先事式，后东平唐长宾、沛褚少孙亦来事式，问经数篇，式谢曰：“闻之于师具是矣，自润色之。”不肯复授。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诸博士惊问：“何师？”对曰：“事式。”^①

唐生、褚生受学于王式，王式所教乃师法所传，后又嘱其“自润色之”，其后应博士弟子选，仍以其学传自于王式，故可知所谓“自润色”不害师法之传。

所以，虽同师之传，仍别有章句，或因以己意斟酌损益，如《欧阳章句》是；或援引他说增益己说，如大、小夏侯是。《公羊章句》《穀梁章句》分属二《传》，自不必言。至于施、孟、梁丘三家，施氏传田王孙学，守师法较之孟喜、梁丘贺为严；孟喜虽受业于田王孙，然援《易》家阴阳灾变之说敷衍己说，故不同于施氏；梁丘贺亦曾师事田王孙，然又从京房受

① 《汉书》，第3610页。

《京氏易》，故其说又异于施、孟^①。

章句之学传至东汉，弊窦丛生，琐碎订诂，辞字训释，动辄万言。后人以章句琐碎，或以其为训诂之学，无关义理。然究其根本，章句为义理之学，故有章句者，多为今文学。据《汉书·儒林列传》云：

（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②

玩味此言，丁将军所作《易说》，被后世追称为《小章句》，则此《易说》似当符合章句之体例，所谓《小章句》者，因其三万言，乃章句之小者也。所谓“训故举大谊”者，非是《易说》唯训故举大谊，乃是《易说》之训故，举大谊而已。此《小章句》既称《易说》，则其体例必符合“说”之体例。刘歆《让太常博士》曾批评各家博士“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则“说”为“末师”口传之学，即为章句之学。吕思勉先生曾断言，“汉世所谓说者，盖皆存于章句之中。章句之多者，辄数十百万言，而《汉书》述当时儒学之盛，谓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儒林列传》可知章句即说。”^③又《汉书》刘歆本传曾云：

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④

由此文可知，刘歆之前，传《左传》止训诂而已，刘歆则引传文解经，转相发明。孔颖达《左传正义》曾引刘歆关于《左

① 《汉书》，第3598~3600页。

② 《汉书》，第3597~3598页。

③ 《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90页。

④ 《汉书》，第1967页。

传》之说，如隐公元年，关于《传》文“不书即位，摄也”刘歆解释云：

恩深不忍，则《传》言“不称”；恩浅可忍，则《传》言“不书”。^①

又桓公三年，“有年”，刘歆解释云：

有年、大有年、有鸛鹄来巢，诸言有者，不宜有之辞也。^②

所谓“转相发明”者，盖如是。因此，上文所谓“由是章句义理备焉”，乃是指刘歆转相发明使得《左传》具备了章句化，也就是“义理”化的可能。由“章句义理”可知，章句本身即是阐释经典之义理。

综上，章句之解经，或敷衍师说，或旁涉他说，目的是使经典义理畅通乃至自成一家。

上述涉及章句兴起之时间、章句解经之法，然纵明了此二者仍不足以窥见章句之根本。欲明章句之性质及其意义，必须对该问题作深入地讨论：章句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经典的存在方式。

朱子撰《四书章句集注》，将《大学》《中庸》两篇从《礼记》中分离出来，独立成篇，并重新编排次序，改变经典的读法，于是赋予了二者新的内涵。可以说，朱子此举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学》《中庸》两篇的存在方式，而这种存在方式直接关涉着读经典的人的精神品质。

皮锡瑞以“大道多歧亡羊”来形容经学师法歧中又歧的混乱局面，进而推崇汉初经学，原因是汉初一经对应一说，不似

① 《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8页。

② 《春秋左传正义》，第158页。